

伟大的古田会议精神是从哪里来的(上)

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副军)、教授 金一南



古田会议只开了 2 天(1929 年 12 月 28~29 日)，但它的历史意义却重大而深远。从井冈山朱、毛红军胜利会师以来，持续了一年零八个月的各种争论，在这 2 天的时间里作出了最终定论。所以，要全面认识古田会议的重大历史意义，仅就古田会议的地点、内容、决议来认识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放到古田会议召开前复杂的历史背景下予以全面认识。

深入研究古田会议前后的党史军史，有一种感受越来越强烈：没有朱、毛之争就没有古田会议，没有前委、军委之争就没有古田会议。

在古田会议召开前的争论过程中，涉及我党我军的众多重要历史人物，毛泽东、朱德、支持朱德的陈毅、支持毛泽东的林彪，以及在其中激化矛盾的刘安恭，还有作为中央领导人的周恩来，且他们各自的人物关系基本上也在古田会议召开前后完成了整合。所以，古田会议不仅对我军具有深远影响，对我们党都影响巨大。

探究古田会议的到来去脉，便会发现它深层触及朱、毛红军会师以来出现的种种深层矛盾和问题。1928 年 4 月，朱、毛红军胜利会师，使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尤其是党领导下的武装力量得到了空前加强；4 月 28 日，根据湘南特委的决定，会师红军建立了工农革命军第四军；5 月底，根据中央的要求，改为工农红军第四军，这就是红四军的由来。这是朱、毛红军会师的重大成果，没有这次会师，红军的战斗力不可能提升得如此之大。

当年红四军的编成：第 28 团，南昌起义的部队；第 29 团、第 30 团、第 33 团，湘南起义的农军；第 31 团，秋收起义的部队；第 32 团，原来占据井冈山的王佐、袁文才的部队。其中，主要力量是第 28 团、第 31 团，也是参加过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的两支队伍。后来，第 29 团、第 30 团和第 33 团在“八月失败”后溃散了，第 32 团在红四军离开井冈山根据地的时候也基本损失了。所以，第 28 团和第 31 团就成为中国共产党武装力量的“家底子”。南昌起义部队的领导人朱德，秋收起义部队的领导人毛泽东，也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事力量中两个不可替代的关键人物。

新中国成立后，参加过秋收起义的谭震林曾回忆，“假若朱德不把南昌起义队伍拉上井冈山，而井冈山上只有秋收暴动留下的这一点儿力量，将很难维持下去。秋收暴动的主力，是湖南的农军、浏阳的学生、安源的矿工，战斗力很弱。部队上了井冈山，与井冈山上袁文才、王佐的部队会师，战斗力依然很弱”。谭震林还说，“我们在井冈山时，今天下山打这个也打不过，明天下山打那个也打不过，只好退守山上，凭险据守。朱德带领的南昌起义部队到了，军官几乎都是黄

埔军校毕业的，士兵清一色来自北伐‘铁军’，井冈山由此战斗力大增”。这就是朱、毛会师之后，在第 28 团和第 31 团这两个重要的红军发展来源中，第 28 团——原南昌起义部队起到的历史性作用，同时也奠定了朱德在工农红军中的地位。

当时直接领导红四军的党组织有三个：第一个是湖南省委前委，书记是毛泽东；第二个是湘赣边界特委，书记也是毛泽东；第三个就是红四军军委，毛泽东当过书记，后来，朱德和陈毅也分别当过书记。

根据 1928 年 6 月的中央来信(即“六月来信”)，指示红四军前委要组织军事委员会(即军委)，以朱德为书记，以陈毅为士兵委员会秘书长。后来的前委、军委之争就是由此开始的。

而且，参加过南昌起义的第 28 团和参加过秋收起义的第 31 团，这两支部队在建制上有所不同。秋收起义部队经过了“三湾改编”，确立了“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而南昌起义部队只在连一级设立了党代表。毛泽东后来就讲过，“红军之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两年前，我们在政府军的组织完全没有抓住士兵，即在叶挺部也还是每团一个支部，故经不起考验”。毛泽东提到的“叶挺部”，就泛指南昌起义部队，当时在每个团设一个党支部。毛泽东讲话的意思，其实就是指在党的领导绝对化方面，秋收起义部队是强于南昌起义部队的。

当时，参加过南昌起义的第 28 团的一些“铁军”老兵，打仗时战斗力的确很强，但他们长期脱离生产、脱离群众，加上对打土豪、分浮财和“共产”的误解，片面地认为“你的就是我的”，战场纪律、群众纪律意识比较淡薄。当时的情况是，南昌起义的“铁军”瞧不起秋收起义的“农军”，嫌“农军”土气，没有经过正规训练，没有打过硬仗。秋收起义的“农军”也看不惯南昌起义的“铁军”，认为他们流里流气，有兵痞、军阀主义倾向，等等。南昌起义部队打胜仗多，人多枪好，但不愿意把枪支拿出来支援“农军”。秋收起义部队收入较多，财政状况较好，但也不愿意拿出来资助“铁军”。

谭震林回忆说，“当时，朱德到第 31 团讲话不大受欢迎，毛泽东也轻易不到第 28 团去讲话。现在，我们说到井冈山，首先想到的就是朱、毛胜利会师的大油画，其实，朱、毛会师后形成一体化的坚强红军力量，那是古田会议以后的事。古田会议以前，南昌起义部队和秋收起义部队在管理和作风上差别明显。因此，这两支部队走到一起，最初的争论和斗争是难以避免的”。

斗争的起因，由柏露会议开

始。当时，会议的议题就是“井冈山守不守、留不留”的问题，究竟是巩固井冈山根据地还是出击赣、闽，朱、毛在会上就争起来了。

当时的大背景是：1929 年 1 月，蒋介石对井冈山地区进行第三次“围剿”，调集了 8 个旅约 3 万多人兵力，给井冈山带来了巨大压力。这时候，双方发生了分歧。毛泽东坚持固守井冈山，认为井冈山地势险峻、易守难攻，敌来则集中对付敌人，敌去则分兵发动群众，根据地的扩大应采取“波浪式”发展，但一定不要放弃它；朱德则认为不行，要跳到外线打游击，放弃井冈山。朱德认为，井冈山东、西被湘江、赣江夹住，无法徒涉，南、北也难以发展，缺乏足够的回旋余地，红军应出远道打游击，光守井冈山守不住。

当时还有一个现实情况，两军会师后井冈山兵力陡然大增。到过井冈山的人都知道，井冈山地区山多人少，供养如此规模的一支红军队伍，经济上很困难，再加上敌人的外线封锁，双方产生意见分歧在所难免。毛泽东认为，朱德要放弃井冈山去打游击是“游击主义”；朱德认为，毛泽东守住井冈山不放手是“保守主义”。今天，当我们客观地分析这一争论，也不能说毛泽东当时的意见都是对的。

后来，毛泽东被迫同意出击赣南。出击赣南后，他发现赣南、闽西空间非常大，最后就在赣南、闽西建立了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苏区。粟裕当时还是红军的一名基层干部，任第 28 团某连政治指导员。粟裕就讲过：“井冈山作为一个防守的要地是可以的，但作为一个战略出发地不行。”因为井冈山地域狭小，资源有限。

由此可以看出，最初的朱、毛之争，朱德出击赣南的意见是相对合理的。当时，在他们两人各持己见、争论不下的时候，陈毅出来做调和和工作。陈毅认为，朱、毛各有道理，井冈山地势险要、易守难攻，的确是难得的好地方，但“人口不满两千，产谷不满万担”，敌人还在搞经济封锁，无法满足红军打游击，很难打破敌人的第三次“围剿”，红军将陷入困境。

柏露会议最终采纳了陈毅的意见，决定由彭德怀率第 30 团和袁文才、王佐的部队留守井冈山。朱、毛率领红四军主力第 28 团、第 31 团出击赣南，外线作战，引开敌人，打破经济封锁。当时还没有想到建立广大的苏区，本想引开敌军后再回来，结果一去不回。因为，一出去就发现了赣南、闽西这块更好的根据地。这说明，朱德当时坚持出击赣南打游击的意见是正确的。毛泽东后来也欣然采纳了此意见，与朱德合力开发了赣南和闽西革命根据地，而闽西就包括古田。

但从井冈山出击后的红军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当时，刚刚下山后的红四军非常困难，前有堵截、后有追兵，连续打败仗。加上沿途都是无共产党组织、无革命群众的地方，红军处境十分被动。那真是红军最困苦的一个时期。

困境导致争论。困境的原因是什么？当时，部队在给养、宿营方面面临很多困难，大家觉得第 28 团、第 31 团不能合在一起，想分兵，由朱德带一部分力量，毛泽东带一部分力量，各干各的。这就是所谓集权、分权之争。集权、分权之争，起因就是由分兵开始的。后来的罗福璋会议有一个重要话题就是“分兵”。

罗福璋会议前，红四军部队进行了改编，这个改编就是为分兵作出的组织准备。部队改编为两个纵队：一纵队由第 28 团、特务营合编，党代表陈毅，纵队长林彪；二纵队由第 31 团编成，党代表蔡协民，纵队长伍中豪。当时，毛泽东坚决

反对分兵，他认为，只有整个红军主力在一起行动，才不易被敌人各个击破。

所以，在 1929 年 2 月 3 日召开的罗福璋前会议上，朱、毛发生了激烈争论，毛泽东坚决压下分兵意见，决定不讨论这个问题，引发了大多数人的不满。最后，毛泽东在罗福璋会议上以前委的名义提出，朱德任书记的军委暂停办公，军委机关改编为政治部，毛泽东兼任政治部主任，实际上就使朱德失去了决策权。

当时，毛泽东领导前委，朱德领导军委，要想不分兵，里面就有个“统一领导”的问题。为了断掉分兵的念头，毛泽东干脆把军委撤了，将军委改编为政治部，自己兼任政治部主任。这个决定后来被一些人说成是毛泽东集权，既担任前委书记，又担任党代表，还兼任政治部主任，大权独揽，也为以后更激烈的争论埋下了“根”。

当时取消军委后，最初一段时间红军发展还是很顺利的，没有了前委、军委的相互掣肘，毛泽东指挥战斗得心应手。当时打得很顺，歼灭了敌人 2 个团，是红军下井冈山以来第一次打胜仗。

正当红军局面有所好转之时，中央的“二月来信”也到了前线。“二月来信”是中央考虑到前期毛泽东、朱德反映的，红四军离开井冈山后极为困难的实际情况，在听取了共产国际的意见后提出的，要求朱、毛毅然脱离部队，速来中央，让红军留在原地分散打游击，因为朱、毛在一起目标太大。但中央“二月来信”到前线时已是 4 月份了，当时的局面已有所好转，红军已不再被动挨打了。所以，对中央“二月来信”的意见，朱、毛都表示反对。

毛泽东以红四军前委的名义复信中央，指出中央“二月来信”对红四军当时的客观形势和主观力量估计于悲观，意见不切实际。朱德虽也不同意“二月来信”的观点，但认为不应批评中央。两人的意见大体是一致的，但表达的方式不同。

当时，毛泽东是下级，上海的中央是上级，毛泽东写信批评中央，就留下了后来被人指责“不服从中央领导、直接写信与中央决策对抗”的话柄。红四军中一些主张分兵游击的人，就以此事为由，讲毛泽东不服从中央、大权独揽，再次要求红四军分兵游击。

应该说，中央的“二月来信”，不仅没有调和朱、毛之间的矛盾，反而使矛盾扩大化了。正在矛盾扩大的时候，来了一个关键性人物刘安恭。刘安恭的到来，直接导致朱、毛之争呈现白热化。刘安恭没有来以前，朱、毛之争还只停留在口头交锋，即便在毛泽东采取组织措施撤销军委时，朱德也没有提出过任何实质性意见。但刘安恭一来，却挑起了很多事情。

1929 年 5 月，中央派刘安恭到红四军工作。刘安恭早年留学德国，参加过南昌起义，后来又 to 苏联学习军事。但他的身份背景比较复杂，在苏联学习期间因为托派嫌疑被苏方遣回，中央也因此将他放到苏区工作。但苏区的同志却不知道这些，还认为是中央派来了一位从苏联回来的“大员”。所以，红四军内部争论双方都想争取他的支持。

毛泽东首先作出表示，在前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提议成立红四军临时军委，在前委的领导下抓军事工作，由刘安恭担任临时军委书记。同时，毛泽东还将政治部主任让给刘安恭来当。这样，刘安恭不仅担任红四军临时军委书记，还身兼政治部主任一职。

当时，政治部的权力很大，部队“打土豪、分田地”所得及一些筹款都由政治部分配，这在当时是重

大的资源分配权。毛泽东主动将这个权力让给刘安恭，实际上是想争取刘安恭的支持。但让毛泽东没有想到的是，刘安恭却是支持朱德的，不仅因为他们是四川老乡又曾一同留学德国，还因为刘安恭并不认同毛泽东的一些做法和观点。

在一次前委会上，刘安恭说红四军的规章制度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里都没有记载，“一个字也对不上号，都是你们自己搞的，不合规范，土里土气，农民意识太强，应该统统废除”。刘安恭的这种态度是毛泽东最为反对的，就是“言必称希腊”。毛泽东忍不住回应：“脑袋长在自己肩上，文章要靠自己作，苏联红军的经验要学习，但这种学习不是盲目的，要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毛泽东历来主张这一点。刘安恭听了很不高兴，打断毛泽东的话说：“你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缺乏信仰，马克思列宁著作就是要句句照办，你这里老改，改马克思列宁的话不行。”

本来，朱、毛之争的“温度”并不高，毛泽东处于主导，朱德虽然内心有些不同意见，但也没有激烈的动作。但刘安恭一来就挑拨：毛泽东给中央的回信是反中央的，朱德虽有不同意见但保留，是服从中央指挥的，毛泽东是不服从中央指挥的。这就一下子把朱、毛之间的斗争“温度”撩拨得更高了。

陈毅是反对刘安恭的，他和林彪都特别看不上刘安恭。陈毅后来到上海向周恩来报告时讲，以刘安恭的身份，开始大家对他还相当信任，觉得他是中央派来的特使，“外来的和尚好念经”。因为，在红四军中，一般同志工作日久、相处极密，彼此长短都知道，外边初来的人，至少同志们不知道他的短处，同时也没有什么成见横梗于胸中，工作就容易了。但没想到的是，刘安恭来后却激化了矛盾。陈毅说，本来就想让刘安恭当个副营长，可最后却让刘安恭当了纵队司令员，一纵队司令员是林彪，二纵队司令员就是刘安恭。

客观上说，当时的刘安恭，在朱、毛之间的分歧问题上起到了负面“催化剂”的作用，使得一场党内的斗争达到了白热化。

当时，有两个情况很反常：一是，1929 年 5 月 23 日，朱德、刘安恭两人联手上报给中央的红军第四军报告，两人签字后就直接送上去。本来，红四军的报告都是朱、毛会签后呈送的，可刘安恭来后取代了毛泽东政治部主任的职务(当然也是毛泽东让给他的)，所以，军长朱德、政治部主任刘安恭签字后报告就送上去了。毛泽东作为前委书记记签字的权力都没有了；二是，毛泽东后来专门给中央写了个报告，署名“前委书记毛泽东”。以前，红四军的报告从不这样署名，都署名是“前委”。他在报告中说，党内目前出现了一些毛病，正在“改进中”。当然，这个“改进中”并不像毛泽东最初报告的那样乐观，其实已经有点失控的态势。

从后来的一个历史细节中也可以看出。1929 年 6 月 18 日，红四军在龙岩小池召开作战会议研究部署“三龙龙岩”，会议竟然没通知毛泽东参加，只通知了政治部副主任谭震林。由此可见，刘安恭来了以后，文件不让毛泽东联署了，开会不让毛泽东参加了，这种组织隔离的措施必然使毛泽东产生“枪要指挥党”的危机感，直接导致党内的斗争进一步升温。本来，大家都认为刘安恭到红四军后能够调和朱、毛之间的矛盾，结果刘安恭来后却让事态变得更为复杂了。

(本文原载于解放军报社主办的《国防参考》杂志。原文较长，本报分两期刊发。下篇将刊登于最近一期的《东昌时讯》文史版，敬请广大读者关注)